

英国学派与两岸国际关系研究

石之瑜

一、英国学派与国际关系四次大辩论

美国国际关系的研究文献中出现过几次重要的辩论,曾留学美国的同仁都耳熟能详,即使仅受本土教育训练的硕士班毕业生也能琅琅上口。简言之,第一次辩论是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第二次辩论是行为主义学派对传统研究学派;第三次辩论是新现实主义对新自由主义,后来这次辩论扩大成为这两者共同面对后结构主义的第四次辩论。虽然中文环境下的国际关系研究者并未真正参与其中,但随着这些辩论的发生,现实主义、行为主义与新现实主义作为相对优势的研究取向,都在中文相关文献中得到反映。^① 由于中文政治学界的行

① 例见阎学通:《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美国霸权与中国安全》,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楚树龙:《中国的国家利益、国家力量和国家战略》,《战略与管理》1999 年第 4 期,第 13—18 页;王勇:《论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实证方法:兼评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研究》1994 年第 4 期,第 34—40 页;邱坤玄:《霸权稳定论与冷战后中美权力关系》,《东亚季刊》2000 年第 3 期,第 1—14 页;吴玉山:《抗衡或扈从:两岸关系新论》,台北,正中出版社 1997 年版;吴玉山:《仍是结构现实主义》,《政治科学论丛》2002 年第 12 期,第 1—32 页。

《国际政治科学》2005 年第 1 期(总第 1 期),第 132—148 页。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为主义研究基础不深,加上对于新自由主义的制度理论充满兴趣^①,因此即使熟知大辩论文献脉络,我们仍根据这几次辩论的学派对中文文献进行归类,这有一点类似英国学派的处境。

英国学派是马丁·怀特(Martin Wight)、赫德利·布尔(Hedley Bull)、约翰·文森特(John Vincent)、亚当·沃森(Adam Watson)、安德鲁·哈瑞尔(Andrew Hurrell)、巴里·布赞(Barry Buzan)、约翰·拉吉(John Ruggie)、马丁·肖(Martin Shaw)等等大多属于英国籍的学者,所被冠以的共同称呼。^②虽然不宜将之视为具有一致性主张的学术群体,但他们起码都无法被任意框进美国国际关系的辩论脉络中。如果说要参与辩论,比较确定的是他们在第二次辩论中属于传统学派,因为他们绝不属于行为学派,而更重视历史分析途径。不过总体看来,英国学派的影子在这一系列的其他辩论中,仍然间接地有所回应。比如,英国学派虽非理想主义者,但显然不会赞同现实主义者将英国学派与理想主义者对立起来的做法^③;英国学派虽非新自由主义者,但不会参与新现实主义者将权力均衡从理论上加以结构化的努力^④;某些英国学派理论有时成为某些后结构主义者反对的对象^⑤,但与后来出现的调和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与后

① 例见王逸舟:《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安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贾中筠:《为了民族的最高利益,为了人民的长远福祉》,《太平洋学报》1992年第4期,第10—15页;叶自成:《中国反霸思想中的矛盾及其超越》,《太平洋学报》1999年第4期,第66—73页;时殷弘:《现代国际社会共同价值观:从基督教国际社会到当代全球国际社会》,《国际论坛》2000年第1期,第4—9页;俞正梁:《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新世界格局》,《复旦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1期,第1—6页;张亚中:《两岸统合论》,台北,生智出版社2000年版;杨永明:《中共主办 APEC 之国际政治与经济意涵》,《亚太经济合作评论》2001年第8期,第21—25页。

② 即来自批评者所贴的标签,参见 Roy Jones, "The Engl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for Closur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14, No. 1, 1981, pp. 19—44。

③ 结合了古典现实主义的权力观点与理想主义对国际间形成互动秩序的期盼。参见 Adam Wats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Society: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1992); 或将英国学派与建构理论联系起来,见 Ole Wæver,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oretical Promises Unfulfilled?"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27, No. 1, 1992, pp. 147—178。

④ 权力均衡因而是一种社会现象,而非结构定律,参见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London: Macmillan, 1977)。

⑤ 例见 David Campbell, "Political Prosaics, Transversal Politics and the Anarchical World" in M. J. Shapiro and H. R. Alker, eds., *Challenging Boundarie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p. 3—31。

结构主义的社会建构主义,颇有能够相互援引之处。^① 英国学派这种既在辩论脉络之外,又因为不时零星应战而加入辩论的情况,似乎可以类推出某种台北学派或中国大陆学派的雏形。

中文语境中的国际关系研究能否加入英国学派,即使在近年对英国学派兴趣渐浓的学术界也未直接探讨这一问题。事实上,中文国际关系学界的研究取向,也是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兼而有之,对行为学派的研究方法不尽欢迎,对社会建构主义的重视远大于对后结构主义的重视。^② 这些倾向,虽然伴随着零星出现的现实主义对其他范式的学术观点的批评^③,但这些批评还是处于点缀的程度,以至于整个知识界大体上仍表现了浓淡不一的英国学派风格。换言之,中文国际关系研究中,尽管受到霍布斯(Hobbes)、格劳秀斯(Grotius)或康德(Kant)等欧洲哲学文本的影响不很深刻,但已经接受了这些文本所描述的国际关系性质,因此可以说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英国学派。中文文献如果能称之为某种学派的话,其与英国学派的差异在于,中文学术文献对行为主义的态度,不如英国学派那样旗帜鲜明地抱持反对立场;对于新现实主义所强调的体系结构,中文文献也在一定程度上加以采纳。^④ 那么,能否说中文国际关系文献是带有科学性质的英国学派呢?

① 参见 Nick Rengger, "A City Which Sustains All Things? Communitarianism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Millennium*, Vol. 21, No. 3, 1992, pp. 353—369; Hidemi Suganami, "Alexander Wendt and the English Schoo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No. 4, 2001, pp. 403—423。

② 例见秦亚青:《世界政治的文化理论:文化结构、文化单位与文化力》,《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4期,第4—9页;郭树勇:《建构主义与国际政治》,北京,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杨广:《国际体系的形成、稳定和变化:图解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欧洲研究》2002年第5期,第62—73页;袁易:《中国遵循国际导弹建制之解析:一个社会建构论的观点》,台北,五南出版社2004年版;莫大华:《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的原型、分类与争论:以 Onuf、Kratochwil 和 Wendt 的观点为分析》,《问题与研究》2002年第5期,第111—148页。

③ 例见张睿壮:《“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是一个错误命题之二》,《多维周刊》,见 <http://www.chinesenewsweek.com/42/Commentary/3031.html>;张睿壮:《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外交哲学?》,《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第54—66页。

④ 例见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区域冲突:论美国在重大区域武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美国研究》1995年第4期;赵全胜:《解读中国外交政策:微观、宏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台北,月旦出版社1999年版;王义桅、倪世雄:《均势与国际秩序:后冷战时代的思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2期;吴玉山:《两极体系的崩解与中共的外交政策》,载于江振昌主编:《国际新秩序的探索与中共》,台北,国际关系研究中心1993年版;张亚中:《中共的强权之路:地缘政治与全球化的挑战》,《远景季刊》2002年第2期,第1—42页。

本文以下探讨英国学派对中文国际关系研究有何启示:在没有欧洲哲学传统,但具备留学美国的学术背景之下的国际关系文献,能不能产生某种对国际关系研究的知识论立场?首先,从英国学派所归纳得出的国际关系知识风格与美国的国际关系文献风格相比,其间之差异为何?本文探讨的既然是知识立场的输出,则穷究英国学派的哲学与历史基础,就不如细究英国学派的风格更相关。接着探讨中文的国际关系研究受到什么背景的制约,从而使其研究立场向英国学派风格倾斜,或向相反方向逆行。另外,中文国际关系研究能否从中国历史与哲学文本中撷取智慧,以弥补对欧洲哲学传统的生疏,则值得将来另行文探讨。^①

二、英国学派的风格

国际关系英国学派的风格,是对具体决策情境的重视,故一方面承认国际政治中恃强凌弱的现实,这种现实具备客观性,不受政治决策者个人的偏好所左右;但另一方面,各国政治决策者在现实环境中如何因应,又受到他们共同接受的各种传统与规范所制约,并不能由无政府的现实状态中直接推出。决策者的习性与智慧因而影响了国际政治的现状,使得国际政治学更多的是一种充满艺术性质的知识,而不是以找寻简易而普遍的行为法则为目标的知识。透过领导人的理性与信仰,恃强凌弱的客观现实可获得一定程度的节制。各国决策者之间的沟通可以充满尔虞我诈,但也可以彼此信任合作,或介于其间,全赖特定时空与特定事件所提供互动的机会。在这些机会中,决策者运用何种规范是十分关键的判断,他们在一念之间对现象如何解读,是英国学派理所当然会同意的研究课题。

既然当事人的判断是分析者理解外交决策的重要关键,当事人对于国际形势具有什么样的常识,就值得加以探究。所谓常识,涉及两国之间或国际上既

^① 比如从春秋、三国到清末、民初之外交思想,墨子、诸葛亮、李鸿章、顾维钧等人之外交思想,历朝历代之统治思想、国家思想等。参见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王承仁、刘铁军:《李鸿章思想体系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岳谦厚:《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丁中江:《评“隆中对策”与“三分”》,台北,淡江大学1990年版;杨一民:《兼爱非攻:墨子谋略纵横》,台北,正展出版社1999年版。

有的惯例,也与决策者所处决策环境中长期建立的习性有联系,更与他们的思想背景息息相关。甚至,决策者个人的人格特质,都不能排除成为起作用的因素。英国学派对于一个外交事件的处理,并不是先从某个具有普遍性的理论法则出发,而是先追溯事件发生的来龙去脉,在此基础上观察决策到底是沦入以强凌弱的国际现实里,还是发展出合理且合宜的利益行为,并研究该决策是如何逐步发生的。简言之,即使国际政治中的权力现实不能改变,但决策者仍有自己可以发挥的能动空间,因此国际政治并无必然遵循的路径,即法则不能直接决定行为,概念不能取代常识。

依此,可以归纳出十二个彼此相关的英国学派特色:

(1) 英国学派不强调外在客观结构,而在前提上认为决策者在特定事件发展中可以发挥能动作用。这并不表示英国学派反对有客观的外在结构,或反对外在客观结构对行为有所限制。相反地,英国学派在态度上十分重视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现实,因此主张需要努力研究决策者如何因应,亦即认为决策者因应之道不只一端,而是必须有所抉择,决策者的能动性就在其所作的决策中展现。尤有甚者,英国学派的知识前提采取了客观主义的立场,接受外交决策与国际关系的知识是属于客观知识的假定,这可以说是某种非结构的客观主义。由于英国学派对知识的务实态度,因此他们对于行为主义的批评,与后结构主义彻底质疑客观主义的主张有异,而相信决策进程是可以从事后的描述中完整再现的。

(2) 英国学派对结构主义的保留,很容易促使人们进一步怀疑,社会科学家追求行为法则并无普遍意义。对英国学派而言,无政府的现实不等同于行为法则,从无政府的现实中得不出具体的行为法则。法则既不能解释事件的发生,也不能决定事件的结果,历史事件是充满偶然性的,故每个决策者虽然都应该因应强权在特定时空中的某个议题上的崛起,但既可以选择与之共谋,也可以选择建立均衡的联盟关系对潜在的强权加以牵制,更可以选择厉兵秣马、整军经武。如果是选择谋求结盟关系,则如何择定一个战略同盟,就成为决策者下一个要作的决断:是看经济发展或军事武力,还是看潜在国力或既有国力?决策者的决断方向并非能够根据法则进行事先预测,决策者的决策方向不可避免地形成历史发展中不可先定的某种偶然性。

(3) 国家的实力固然限制了决策的空间,不过决策者如何理解自己国家的实力,以及如何根据自己的理解采取行动,必须根据决策者的品质与性格来分析。不同的决策者对于世界局势的看法会有不同程度乐观(或悲观)的评估。这样的评估受到各国决策者之间的关系的影 响,因而对决策者个人性格的掌握,要比抽象的国力对比分析,更有助于分析外交形势的发展。也就是说,两个国力相若的国家之间是形成敌对的还是友好的互动倾向,并非全由国力所决定。国力消长既是一种实力的变化,也是一种形势的判断,它如何改变特定的两个国家之间的联盟或对立关系,需要细腻的性格分析。英国学派不把宏观的权力分布与微观的决策风格、态度或个性分成优先次序不同的两个因素,而是一并重视。

(4) 国力对比能起什么具体作用,是常识判断的问题,决策者在自己曾经历过的决策历史中,得出各自不同的教训。不同的经验教训是英国学派极为重视的分析课题,这就大幅扩大了理性抉择的范围,故理性不仅专指狭隘地依照本国在权力结构中的位置,做出所谓符合权力理性的战争结盟政策,而且也包含着本国近代与当代经验中处理同类事件、应对同一对手时的情感记忆以及随之而产生的信任或猜疑。教训同时作用于集体与个体的层面,决策者个人记忆的历史教训与所属社会的历史教训不尽相同,均不能简单地根据抽象逻辑演绎出来。不论是性格或常识都不宜普遍化或抽象化,这与中文国际关系文献中对领导人与历史记忆的重视,显得格外相似,从而赋予国力结构与理性抉择分析更丰富的变化。

(5) 英国学派对历史的立场,与经历四次辩论后的美国现实主义文献颇为不同,故对历史的看重是英国学派突出于美国文献的第五个知识风格。相较于现实主义对实证研究的日益重视,第二次大辩论后,英国学派直接参与国际关系理论辩论的必要性日益降低,一直到社会建构主义发轫时才又复返,只是社会建构主义并不能引起主流现实主义认真对话的兴趣。历史分析与实证分析之大不同,在于后者将时间作为一项代理变量^①,从而将特定历史时间点上的事件或行为看成是某个待发现的普世法则的一次呈现,不具备特殊性。英国学

^① 代理变量本身没有意义,只能反映其他真实变量,但因不知道真实变量为何,故暂时采用代理变量。

派的具体作风虽然因人而异,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均可说是属于历史主义,亦即认为历史事件皆有不能完全相互取代的时空条件。毕竟,历史若可以成为后世学习的教训,就不至于重蹈历史覆辙,从而不能确保自我重复。

(6) 对历史主义的认可,使得站在任何一个抽象理论架构中所进行的比较分析,相形之下失之肤浅,因此英国学派宁可针对具体历史经验,而不轻易归纳理论主张。对英国学派而言,一次外交事件并非任何理论的个案,因为如果是理论个案,那么其意义就在于能反映出普遍性的法则。且每一研究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不同个案之间的比较,以便更充分地掌握影响到行为过程的理论变量。相对于此,英国学派的个案,并非某一理论主张的一次呈现,而是就其本身的开展予以充分的说明,其中的诸多转折当然可以反映某种耳熟能详的理论主张,然而这既非必然如此,而且就算是如此,也不能论断同一主张一定会体现在其他个案中。对英国学派而言,理论的普遍化不是研究的起点,更非终点。

(7) 英国学派注重惯例,认为国际政治的运作相当程度仰赖惯例。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辩论在方法上区别于英国学派,因为它们之间的辩论过于重视概念。根据新现实主义的立场,惯例之所以能维系是因为,看似遵守惯例的国家,刚好认为惯例对自己有利,所以起作用的不是惯例而是国家利益。新自由主义的分析则相反,辩称由惯例形成某种程序规范的现象,对国家有利,因为可以大量减少国家之间交往的不确定性,亦即会有利于促成更安定的交往模式。新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便是以权力为依据的国家利益,新自由主义则借由交易成本的概念称许惯例所发挥的规范作用。在英国学派的分析中,惯例的实际内容如何经由协商与实践而逐渐形成,以及各国在决策过程中如何对待这些惯例,是更有意义的分析对象,而不急于在概念上将惯例萎缩为国家利益或交易过程。

(8) 惯例一旦得到更多国家的接纳,便形同一种具有拘束力的制度,这种可能性引领英国学派关注世界政府的形成机缘。在此,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辩论可谓了无新意,是继续纠缠在利益的概念上。新现实主义强调相对利益,亦即霸权国家经由遵守制度所得到的好处,要超过其他国家所得到的好处,才会继续支持制度,否则制度将无法有效规范。而新自由主义则强调绝对利益,相信只要霸权国经由制度得到的好处是正面的,即构成对此制度支持的充

分条件。英国学派并不排斥对利益的分析,但决策者如何看待利益与制度,并非只能是绝对的,或只能是相对的,因为制度形成背后既有理想与思想的力量,也有权宜妥协的因素,而且要根据其他国家行为者的信用与目的来判断。

(9) 英国学派认真对待思想的力量,不像现实主义者将思想仅当成权力的工具。国际政治中的制度安排,随着时代的演变而产生变迁,这些变迁并非漫无目标,而是受到思想力量的牵引。但英国学派绝非单纯是理想主义而已,他们很清楚地认识到国家之间是无政府状态,因此个别国家决策者的思想意图,不能决定结果。不过,没有思想又如何理解行动?故英国学派对于个别决策者在什么样的思想之下调整对外政策,更愿意作具体分析,从而强调实际地描述思想在一个特定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基于这样的分析态度,英国学派的学者对于超越现实利益考量的革命思想,只要影响到决策者,便更有意愿予以认可,故每当国际规范发生看似断裂性的变化时,仍可以提供具有连贯性的分析。

(10) 思想对于行动的牵引,在于赋予目的,但这个目的不能用抽象的国家利益、权力、安全之类的概念所涵盖。目的本身就是动机的来源,其与国家利益是平行共存的概念,而不是必然相互抵触的。虽然安全是主导当代国际关系文献的重要议程,但特定的目的意识会改变决策者对安全的评断。坚定的目的意识是否会使得决策者低估因为执行目的所带来的安全威胁,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在现实主义那里,安全是惟一的目的;在新自由主义那里,目的是可以通过交易而修正的一种偏好。英国学派不在概念上做这样或那样的先验主张,因而容许目的在作为安全和生存意识与作为偏好之外,也可以是将思想转变成为具体决策过程中的一种动机,有时能改变安全评估或让决策者宁可搁置生存考量。

(11) 从上述这些特色风格观之,如果将英国学派的研究称为一种艺术,丝毫不为过。这与第二次辩论的焦点,以及第三次辩论的前提相比较,甚为不同。随着四次辩论的发生,国际关系文献愈加确认自身的研究议程是科学的,不但将国际关系当成客观存在的某种实在,而且致力将这种客观实在的道理以行为法则表述呈现。英国学派并不挑战有某种外在客观现实,但是决策者参与了外在客观现实的建构,而不是片面地接受与执行外在客观的法则。因而,决策者的决定乃是真正的决定,不能直接以结构的角色扮演者视之。那么,这种决定

的结果能否达到决策者的目的,有无损害国家利益或改变权力分布,是否造成战争,都成为可以也应该加以评价的课题。简言之,英国学派眼中的外交决策像是艺术,他们不认为决策者只是被动的结构代理人。

(12) 艺术象征着权术与谋略,然而英国学派不只是权谋的分析者,同时也是国际政治某种正派行径的记录者。英国学派对于决策者的具体言行更为敏感,对他们具有领袖气质的身段更加欣赏,故在权谋之外,其作品将国际关系的阶级气氛加以传播,因此才有英国学派充满阶级傲慢的说法。^① 外交官的互动及风度未必能经常改变恃强凌弱的无政府状态,但能够经由人身的尊贵合宜姿态,在偶然间修正了历史某些微末的安排,从而为国际关系出现偶然性变化提供了更多的机缘。决策者不只是计算国家利益的领导人,也是充满人性、各有脾气、懂得欣赏与需要朋友的人。国家间的互动固有其惯例,但两个国家决策者之间的私谊或关系,也有其脉络,它们之间怎样算是合乎礼仪风度,制约着只考虑权谋的现实主义思维。

表-1 英国学派风格^②

学 派	风 格											
英国学派	能动	偶然	人格	常识	历史	个案	惯例	制度	思想	目的	艺术	礼仪
辩论学派	结构	法则*	国力	理性	实证	比较	概念	利益	策略	安全	科学*	权谋

英国学派在国际关系文献的四次辩论中的参与,有时是间接的,有时则成为对象。美国知识界醉心于理论分析的研究风格,把超越英国传统当成是知识演进的必由之路。^③ 甚至,正是四次大辩论中的第二次辩论,凸显了英国学派作为一种具有特色的研究议程。第二次辩论是由行为学派所发起,所有在行为学派进入国际关系学界之前的研究,都成为所谓的传统学派,其中包括历史分析、国际法与国际组织,这显然就是指英国学派。换言之,英国学派并非自开始即构成一个学派,故与美国知识界以学派为号召、借以自我区隔的风气不同。

① 威廉·卡拉汉:《对国际理论的民族化:英国学派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浮现》,《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第49—54页。

② 一般而言,英国学派风格本质上并不排斥美国国际关系大辩论中的各家立场,但表中带有*号的是英国学派反对的。

③ 例见 Dale C. Copeland,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9, 2003, pp. 427—441。

美国学界对学派区隔的兴趣,与文献辩论中所展示的知识风格类似,都是通过抽象逻辑演绎而得出,英国学派则是在与行为学派对比之下成为学派,并非后来被归入英国学派的学者自己决定的立场。

实际上,英国学派并未将行为主义的研究议程与自己完全对立起来。两者都接受无政府状态作为研究前提,都把知识看成是通往客观世界的认知工具,故可以说在本体论上是相通的。而他们在知识论上也非完全抵触的,对英国学派而言,由几个历史案例推断普世法则是没有必要的,且若因此而将个别事件或决策的细腻过程摒弃于研究议程之外,则失之偏颇。行为学派提出的问题是研究技巧问题,没有必要反对其他不采用这种研究技巧的研究。只是对于行为学派来说,他们的辩论其实涉及知识属性的哲学问题,才会认为不以普遍命题呈现研究结果的作品,不够资格被称为知识。有趣的是,这两种对国际关系知识的态度,都对中文文献有吸引力。

三、英国学派在两岸国际关系研究议程中的局限性

以科学主义知识论所设定的客观性、抽象性和普遍性的立场,在不同的时间点上进入各地的中文文献。20世纪80年代初期,台湾的国际关系研究便引入了类似行为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系统分析。^①不过到了90年代以后,系统分析的流传仍没有出现更大的发展与深入。若以对美国与对中共的外交分析为例的话,科学主义的研究设计上十分重视研究对象的国家权力大小,统计资料受到较多的引用,但这些研究与英国学派的分析并不抵触,因为英国学派也重视权力的大小,也不会排斥参考统计资料。所不同的是,少数采纳了新现实主义理论架构的分析,对于决策者决策空间采取了极大的限制,认为决策是在反映体系的结构。^②但到9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了较大的发展,开始依照新现

^① 例见蔡政文:《核子时代国际关系的特质》,台北,三民出版社1978年版;包宗和:《台海互动的理论与政策面向:1950—1989》,台北,三民出版社1993年版;明居正:《国际政治体系之变迁:二元体系之崩解及未来新秩序》,台北,五南出版社1992年版;林正义主编:《东南亚区域安全体系的研究:理论与实际》,台北,“中央”研究院出版社1998年版;吴玉山:《台湾的大陆政策:结构与理性》,载于吴玉山、包宗和主编:《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台北,五南出版社1998年版。

^② 例见吴玉山:《仍是结构现实主义》;邱坤玄:《结构现实主义与中共大国外交格局》,《东亚季刊》1999年第3期,第23—38页。

实主义理论,建立属于本地的国际体系结构,即战略三角理论。^①

战略三角理论在台湾的国际关系文献中成为主要潮流,说明英国学派在台湾的市场已经有所缩小。战略三角理论采用的方法符合了国际关系辩论中反对英国学派的立场,因为根据战略三角理论,美国、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折冲连横,是属于某种逻辑可能性的组合,而参与三角的各方,其利益的界定,是依照自己在三角关系中的位置来界定的,而决策者的目的,则是争取在三角关系中某种特定的位置,故三方决策者的利益观与目的均非由各自的历史脉络中得出,而是反映理论所主张的客观结构。在三角战略分析之下,两岸之间的内战历史,各方彼此互动中的默契或惯例,执行政策时对他方合乎礼仪的尊重等英国学派所爱好的观察视角完全都模糊了。

与战略三角理论相对立的,则是反映了新自由主义的一些分析。比如将欧盟模式引入两边或三边关系的可能性,或经济贸易关系对两岸互动的规范,重点分析这些制度或建制性的安排是否能够提供各方采取合作的充分诱因。^②这些分析相较于英国学派进入具体时空与人格,观察思想、目的与政策艺术的习惯不同,所以虽然不采取三角战略的观点,依旧有碍英国学派开拓土壤。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在台湾并无交集,且互不辩论,但是很明显的趋势却是,历史分析、思想价值、人格态度或经验教训,在台湾的国际关系文献中已然快速消逝。即使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对于何为国家利益——是制衡大陆,还是利用大陆经济资源——看法不同,但它们均有一套先验的利益标准,用来说明决策者作出决策的理性是什么。这种概念导向的分析模式,甚至出现在为数不

① 例见包宗和:《战略三角角色转变与类型变化分析:以美国和台海两岸三角互动为例》,载于包宗和、吴玉山主编:《争辩中的两岸关系理论》;吴玉山:《从台北、华盛顿、北京的战略关系看台海危机》,载于许庆复主编:《地球中的台湾》,台北,正中出版社1996年版;林正义:《台湾安全三角习题:中共与美国的影响》,台北,桂冠出版社1997年版;罗致政:《美国在海峡两岸互动所扮演的角色:结构平衡者》,《美欧月刊》1995年第1期,第37—54页;涂志坚、唐欣伟:《从总体观点看柯林顿政府时期的美中台战略三角》,《远景季刊》2001年第2期,第163—196页。

② 例见耿曙、陈陆辉:《两岸经贸互动与台湾政治版图:南北区块差异的推手?》,《问题与研究》2003年第6期,第1—27页;赵文衡:《区域贸易协议与东亚国际政经体系之重组》,《问题与研究》2002年第6期,第81—107页;张亚中:《论两岸治理》,《问题与研究》2003年第6期,2003年,第29—66页;刘复国:《综合性安全与国家安全:亚太安全概念适用之检讨》,《问题与研究》1999年第2期,第21—37页;苏宏达:《欧盟经验与两岸统合:建立WTO架构下的双边商务纠纷解决机制》,《问题与研究》2003年第4期,第1—31页。

多的社会建构主义分析中^①,从而可以看出英国学派在台湾国际关系文献中的处境。

以概念导向的分析,说明美国、中国大陆与台湾决策者的政策选择在事后看来应当是如此的理所当然。这种分析角度,竟与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所采取的说法甚为相符,故有台北必须依赖美国,或大陆必须忍让美国,或美国必须配合大陆等种种不得不然的说法,这就如同决策者把自己的政策责任,转而交付到所谓客观结构的必然性里。似乎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有所共谋,将英国学派封锁住了。不过,台湾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不进行对话的现象,反映了它们对理论问题的不敏感,因此它们对英国学派在台湾蔓延的可能性当然也不敏感。

台湾的国际关系研究受到科学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吸引,有其社会背景,这可分为对自我与对他国两种不同的身份策略有关。在对自我方面,相较于英国学派对历史的重视,台湾国际关系学界的历史分析则日益式微,主要在于近十余年来台湾当局作为一个国际关系的分析单位,其身份由代表中国转变为代表台湾,而历史分析却将台湾与中国的对外政策联系起来,使台湾难以建立独立于中国之外的身份。同时,受到大陆对台政策的制约,台湾不敢公开直接主张“独立”,这使得知识界透过政治目的来分析台湾对外政策随之失焦,而官学界共同将外交论述透过安全、国力、结构等观念,视外交为一种利益计算的过程,就限制了英国学派的空间。

由于追求承认的能力受到限制,台北对于自己改变国际结构的可能性毫无信心,所以在态度上倾向接受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这种强调外在客观结构的知识立场,就不足为奇了。这表明台湾官学界在观念上对弱者的能动性或国际政治中的偶然性,不抱特别的希望。弱者依赖强者成为台湾国际关系学界的分析准则。在自己没有能力改变外在结构的前提下,英国学派所关心的常识、艺术或礼仪尊贵,难以为决策者所感受到,一切似乎都必须仰赖利益交换才能达成,这与大陆官学界能根据国家的需要决策有天壤之别。不过,这并不表示

^① 例见《美欧季刊》第15卷,第2期,2001年;莫大华:《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安全研究》,台北,时报出版社2003年版;张登及:《建构中国:不确定世界中的大国定位与大国外交》,台北,扬智出版社2003年版。

大陆的国际关系就与科学主义是对立的,因大陆推动的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也要求某种重新评价历史的态度,而要重新评价历史最有效的手段就是主张科学主义与客观主义。

至于美国国际关系辩论文献较为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大陆,是迟至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所谓第三次思想解放之际的事情。它最初主要是以翻译的形式出现,在关于大国外交的讨论中,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有针锋相对的争论。主张大国外交的新自由主义者以中国的利益为出发点,讨论大国外交对中国有什么直接好处。相对于此,新现实主义者却同时关心大国外交会在中国与霸权国家之间,带来何种不利于中国的权力再分配。这些辩论并未进入实际的外交事件中,而只是抽象的逻辑思辨。不过,大量的文献继续集中在具体国家的外交政策分析上,或具体外交事件中各国政策立场的介绍上,或各国之间外交折冲与权谋策略的执行上。这些居于多数的政策分析文献,与英国学派的研究方法之间,颇有可资相互参考的价值,其中英国学派似乎更为重视思想价值所起的作用。

随着留美学者返国与国外学者来访日益增多,大陆知识界更有意识地主动理解科学主义的分析方法。由于大陆国际关系作品有相当部分出自智库之手,因此政策分析的任务颇重,学者经常必须与外国学者或政要互访,因此就保留了与英国学派互通的空间。大学教师没有经常性的政策分析任务,受到科学主义的影响较多,明显使得英国学派式的研究风格的影响力逐渐减小。大陆文献有一个现象,即英国学派与科学主义或现实主义的作品可能出自同一作者。这说明并非每位受过美国文献熏陶的学者,都有意识地抛弃英国学派,趋向科学主义,即使是引介科学主义的学者,也可能在不同场合采纳英国学派的研究风格。^①

① 国际关系研究中重视历史、思想、利害与权力的中文文献比比皆是,例见朱锋:《人权与国际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王缉思:《美国霸权的逻辑》,《美国研究》2003 年第 3 期,第 7—29 页;倪世雄、王义槐:《试论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问题研究》2002 年第 3 期,第 22—26 页;任晓、沈丁立主编:《保守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上海三联书店 2003 年版;王逸舟:《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台北,五南出版社 1999 年版;黄仁伟:《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版。

四、英国学派在两岸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机会

如前所述,中文文献与英国学派可以相互沟通之处颇多。中文国际关系文献对于外交决策、习性、惯例、艺术与性格的描述分析,向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课题,更对于决策者服膺的思想价值非常敏感。一方面,中文文献承认决策者受到许多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但另一方面从不排斥个别决策者突破既有限制的能动性,或在既有限制之下进行调整选择的可能。因此,在中文国际关系研究中有可能处理外交决策或事件中的某种关键点,换言之,即认为国际关系受到决策者的选择所影响,事件的发展虽有历史教训可循,但决策者的参与及责任造成历史出现偶然性。一般性的回忆文献尤其注意这些关键与偶然,从而使得决策者的位置凸显出来,故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中文国际关系文献向来是属于人文研究的范畴。

中文文献所搜集的一些外交惯例固然深受研究对象的历史经验影响,因此与英国学派有所重叠,但是在思想、礼仪、风度与目的等方面的研究,却因为中国历史传统中的智慧和教训与欧洲历史所蕴涵的不尽相同,故可以发展出某种与英国学派迥异的论述。^① 比如儒家文化关于天下的观念,封建时代关于朝贡的制度,春秋战国时代关于兼爱非攻、远交近攻、合纵连横的思想与艺术等等,或当代外交风格中讲求的针锋相对、高屋建瓴、以牙还牙、不做大国等等外交原则,想必是英国学派极感兴趣的课题,也使得中文国际关系文献的作者在问题意识上已有充分的准备,去接触并介绍来自不同脉络的外交习惯、思想或礼仪。整体而言,由美国国际关系大辩论所引入的科学主义与现实主义传统尚难取代中文文献中与英国学派相类似的知识风格。

即使行为学派已经开始对中文文献造成冲击,但行为学派的深度与议程,现在仍呈现某种中文式英国学派的分析风格。一般而言,科学主义对中文国际

^① 例见王义桅:《为什么没有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1期,第21—22页;王义桅:《国际关系理论的国家性》,《美国研究》2003年第4期,第22—41页;王义桅:《论比较国际关系学及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开放时代》2002年第5期,第17—23页;梁守德:《国际政治学在中国:再谈国际政治学理论的“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研究》1997年第1期,第1—9页;梁守德主编:《国际政治论集》,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石之瑜:《后现代的政治知识》,台北,元照出版社2002年版。

关系的引导,主要在于概念化方面,即以抽象逻辑的语言,将中文国际关系文献中的若干常识,翻译成不具备中文历史背景的读者可以理解的法则,以建立可以跨国比较的基础。在对中国外交政策的分析中,不论是认为中国加入全球化以提高经贸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立场,或认为要在一超多强格局中制定安全战略的新现实主义,都会对既有外交思想与决策风格有所评论,并经常表达对中国外交战略方向的看法,显然对决策者具备界定国家利益与判断国际形势的能动性,间接但明确地加以认可。同时,科学主义分析方法虽受重视,但是并不能因此就推断出往后外交决策的方向。

不过,中文国际关系的英国学派范式分析面临的重大瓶颈,在于对于欧洲哲学传统不熟悉,仅能简单地应用霍布斯所说的无政府状态,却不能深入掌握各国的外交决策常识与惯例;而另一方面,又不能将中国既有外交思想中的常识、礼仪等有关惯例,用来了解其他国家的外交决策。这不像英国学派学者,轻松地假定各国外交决策都是在欧洲外交传统与哲学脉络下发生。中文国际关系研究可以进一步与英国学派对话的焦点,在于将中国外交传统与中国进入国际体系时的经验教训,与欧洲的外交传统相互比较,将两种传统之间在中国的相互学习与作用,透过个案、人格或历史变迁的角度加以记录,这就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中文英国学派。

台湾的国际关系研究受到行为学派的影响比大陆学界更大,但是英国学派风格在台湾有其特殊发展的机会,因为行为学派对台湾作为决策单位的实力评估并不乐观,在相对于主要互动对象包括美国、日本、中国大陆的情况下,台北只能成为一个受摆布的棋子。这个研究角度不能有效分析台北的外交决策,无法解释台北决策者建立“独立身份”的主观能动性,于是就为英国学派的研究风格提供了机会。长期以来,台湾学界对大陆外交的分析一向都关注社会主义思想、决策者人格、民族主义目标、灵活调整的技巧、国共内战的历史、海外竞逐的惯例。^①但在研究美国外交时,分析角度更强调美国的霸权地位、制衡对手

^① 既有实证,又重视历史与思想,视外交研究如艺术欣赏,如同与古人交友,例见尹庆耀:《中共外交研究》,台北,2001年版(无出版者记录);邵宗海:《美国介入国共和谈之角色》,台北,五南出版社1995年版;苏起:《论中共关系正常化(1979—1989)》,台北,三民出版社1992年版;赵建民:《两岸互动与外交竞逐》,台北,永业出版社1994年版;杨开煌:《谈判策略研究:与中共谈判》,台北,冠志出版社1994年版;张登及:《毛泽东涉外言论与中共外交》,《共党问题研究》1998年第9期,第41—48页。

的理性、体系的概念、小国必须依附的法则与军事安全至上的国家利益观。这两种研究取向分别适用于中国大陆与美国等不同对象。

由于追求“台独”的目标在近年兴起,对外手段益趋弹性,从而利用了弱者与后殖民地的优势。^①台北的决策如何周旋在中国大陆、美国和日本三个强国之间,逐步依照自己的目标,在具备特殊领导性格的决策者推动下,与在各种情境的偶然配合下,发挥能动性,并积累出一定的经验教训,是英国学派可以发挥所长的原因。而在这一连串的问题意识中,台湾的对外政策属于不能归类的一种风格,则台湾国际关系研究因为熟悉台湾的对外政策能动性,所采取的研究设计就更会对偶然性的发展机缘保持敏感性,这时再分析台湾对美政策的现实主义取向,就可以突破现实主义的分析盲点,看出现实主义是一种与美国相处的礼仪规范而已。

五、英国学派参与辩论的潜在机会

英国学派虽然没有持久而热情地参与国际关系理论的每次辩论,但却成为这一系列辩论的重要对象。这使得对美国国际关系文献极为依赖的当代中文国际关系研究,保有一个可以相互支持但非全盘吸纳的潜在盟友。中文国际关系文献与英国学派相互对话的机会,除了在知识论与方法论上相互重叠,使得各自关心的议题,与研究议程上的问题意识,具有不少一致之处,也是因为中文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背景里,有若干在决策过程中的目的意识,不能经由美国国际关系文献辩论的既有立场获得表达,因此带动研究者超脱这一脉的文献来分析外交决策,形成英国学派适用于某些对象与某些事件,而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适用于其他对象或其他事件的现象。根据议题与对象来选定适当的研究角度,使得英国学派面对几次大辩论能保持一种中庸之道,既不全盘否定任何一方,也不走唯我独尊的极端路线,这个中庸的态度与中国知识界的学风颇为类似。

^① 参见石之瑜:《回应中国:“反国家”论述对东方主义的欲迎还拒(以周恩来为例)》,《共党问题研究》第26卷,第12期,2000年,第6—20页;石之瑜:《起手无悔大丈夫:迷失在依附者能动性中的美中战略棋盘》,《远景季刊》第4卷,第2期,2003年,第39—60页。

英国学派的风格既不是与国际关系辩论的各家立场全部相反,也不是与中文国际关系文献中的英国学派式风格全部相合。英国学派对于国际关系处在所谓的无政府状态,以及以国家作为分析之本体,这两方面皆与美国国际关系研究在同一立场。^① 另一方面,中国外交传统中的诸多智慧与英国的哲学传统有别,以至于凡涉及思想、价值、礼仪、惯例与常识等有关内涵时,中文的英国学派就自有风格,为某种台北学派、北京学派或上海学派的出现打下基础。比如,中国外交传统思维中所含有的墨家与玄学立场,进一步在本体论上与英国学派所接受的客观主义有明显区别。这种固有思想脉络一旦加以开展,有利于反对国家本体论的后结构主义文献输入中文议程,倘若如此,将会使得中文的修正式英国学派更加丰富起来,不但与英国学派之间可以对话,在各家中文议程之间也可以尽情对话,就像过去每次在四大辩论中两方的对话一样,借由辩论而形成另一组在美国文献之外的知识对话。

^① 据温德的考证,英国学派的知识论之所以采取客观主义立场,是受到哈特(H. L. A. Hart)的实证主义法学思想所影响。见 Mariene Wind, "Nicholas G. Onuf: The Rules of Anarchy" in I. B. Neumann and O. Wæver, eds., *The Futur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Masters in the Making* (London: Routledge, 1997), pp. 236—289; 另参见 Jim George, *Discourses of Global Politics: A Critical (Re)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oulder: Lynne Rienner, 1994)。

作者简介

孙学峰 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候选人。1997 年和 2000 年在国际关系学院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与人合著《国际关系研究实用方法》(2001 年)。

电子信箱:sunxf02@mails.tsinghua.edu.cn

周方银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候选人。1995 年华中理工大学本科毕业,1998 年国际关系学院硕士毕业,1998 年至 2002 年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任助理研究员,著有《国际问题数量化分析:理论·方法·模型》(2001 年)。

电子信箱:zfy02@mails.tsinghua.edu.cn

陈琪 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教授、博士。1991 年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本科毕业,1996 年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毕业,2002 年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博士毕业,2001 年麻省理工学院访问学者,著有《遏制与绥靖:大国制衡行为分析》(2004 年)。

电子信箱:chenqi@mail.tsinghua.edu.cn

许田波 (Victoria Tin-bor Hui)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助理教授。2000 年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曾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做博士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家形成和国家建设,著有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即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电子信箱:thui@nd.edu

王学东 中山大学政务学院国际关系学系讲师、博士。1996 年南京理工大学本科毕业,1999 年和 2004 年在南开大学法政学院政治学系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理论、中国对外关系。

电子信箱:wangfatty@eyou.com

石之瑜 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兼任 *Political Science* (Wellington)、*Human Rights & Human Welfare* (Denver) 编辑,著有《后现代的政治知识》、《政治学的知识脉络》、《社会科学方法新论》、《当代政治学的新范畴》,以及 *Navigating Sovereignty: World Politics Lost in China; Negotiating Ethnicity in China; Citizenship as a Response to the State; Collec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and Legal Reform in China; Reform, Identity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等。

电子信箱:cyshih@ntu.edu.tw